

本论丛出版得到中华日本学会及拓展文化协会支持

中日民族文化比较研究论丛

第一辑

◎ 蔡凤林 / 主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中日民族文化

比较研究论丛

第一辑

◎ 蔡凤林 / 主编

ちゅうにちみんぞく
ぶんかひかくけんきゅうろんそう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日民族文化比较研究论丛. 第一辑/蔡凤林主编.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 - 7 - 5660 - 0443 - 7

I. ①中… II. ①蔡… III. ①民族文化—对比
研究—中国、日本 IV. ①G12②I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29928 号

中日民族文化比较研究论丛/第一辑

主 编 蔡凤林

责任编辑 满福玺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19

字 数 333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60 - 0443 - 7

定 价 6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日民族文化比较研究论丛

学术指导委员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永平 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木田章义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教授,日本训点语学会会长

东方毅 拓展文化协会会长

刘金才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高 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研究员,
中华日本学会秘书长

徐一平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会长

郭连友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中华日本哲学会会长

崔世广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思想文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韩丽红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蔡凤林 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名誉主编 刘金才

主 编 蔡凤林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福山 尹燕燕 王 玲 韦 丹 卡毛姐 白政文

刘俊民 刘艳文 余新颜 李 蕊 金秀东 胡启敏

郭 颖 塔 娜 舒 敏 赛丽塔那提·哈力克 潘贵民

比较研究中日民族、文化，
积极推进两国关系发展。

——祝贺《中日民族文化比较研究论丛》出版

高洪

二〇一二年六月廿日

拓展中日文化交流史
研究领域，促进中日关系
健康发展。

东方毅

2013年3月3日

总 序

刘金才

一

在当今世界，由于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以及国际互联网的快速普及，各地域、各民族或国家的文化也不断突破其各自地域和模式的局限性而走向世界，出现了世界文化“趋同化倾向”；但与此同时，由于国际政治的多极化、各民族国家交往中的“文化阻隔”^①和文化自觉，以及各文化实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和为确保自我民族文化传统及利益，也出现了“越是全球化就越强调区域化、本土化、民族化”和强化自己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倾向，导致了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②的加剧。特别是在一些有历史宿怨的民族国家之间，如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就相继出现了“文化民族主义”、新国家主义和基于“自由主义史观”的历史修正主义思潮，表现出了强化民族主义，否定和淡化侵略历史责任的倾向，加剧了与被侵略国家的摩擦和冲突。这样两种截然相反且相互驱动的世界性文化发展“趋势”，反映了全球化的统一性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尖锐矛盾，它不仅使人们对鼓噪一时的“文化全球化”的可能性纷纷提出了质疑，而且催生出了在经济、科技全球化的同时进而寻求“文化多元共生”的全球化之理念和诉求。然而要寻求“文化多元共生”的全球化，既需要各民族对自身文化有充分的自觉，又需要以异质性的“他

① “文化阻隔”包括“自然隔离”、“语言隔离”、“社会隔离”和“心理隔离”等内容，它们作为一种机制，既是民族文化传统形成的重要条件和保障，也是导致文化差异的主要原因。

② 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即指“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认为“文化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后冷战的世界中人们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

者文化”的存在为前提，而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程序就是将“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进行比较，正所谓“有比较才有鉴别”，有比较才有进步，有比较才知道“我是谁”、“他是谁”，有比较才知道“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只有如此，才能做到使不同的文化传统、文化特性与文化形态之间的对话、交流和相互认知得以充分展开，才能逐步建构起人类共性的文化认同体系和范式。因此，研究和明辨各民族国家这种共生而多元、相同或相异、抑或异同参半的文化景观，进行不同文化传统、文化特性与文化形态之间的比较、通融与识解，不仅是建构“文化多元共生”全球化之理念和促进各民族国家之间跨文化交流和理解的需要，更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最重要的课题。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缘故，冷战结束以来本就如火如荼的比较文化研究进而成为当今世界人文学界“炙手可热”的显学。

上述在全球化浪潮下凸现的“趋同化”与“民族化”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化发展趋向，在中日之间也几乎是“克隆”式地表现出来。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史，邦交正常化40年来双边贸易额已突破3400多亿美元，地方友好城市多达247对，人员往来也年超500万人次（2011）。然而在两国人民之间，黄遵宪100年前感叹的“只一衣带水，便隔十层雾”的感觉并未根本改观，不仅相互间“居相近、心相远”的心态依旧严重，相互好感度日趋走低，^①而且不间断地发生诸如在“历史认识”问题上那样激烈的摩擦和冲突，致使两国政府即便在纪念邦交正常化“不惑之年”之际，也不得不使用“新的相遇、心的纽带”（「新たな出会い、心の絆」）的主题词，以求用“重新知遇”和“系结心灵的纽带”之姿态，改变“居相近、心相远”的心态和摩擦、冲突频发的现状。因而对于中日民族文化研究者来说，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关注和加强对中日自古以来基于文化生成、文化交流和文化选择而形成的文化关系诸相，以及相互间因“文化阻隔”所造成的文化隔阂，进行具有广度和深度的考察、比较和研究，辨明和解明两个民族国家在历史、语言、宗教信仰、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情感取向以及民族特性等方面的异同及其原委，为促进两国人民间的跨文化认知和相互理解，增进相互间的文化认同感而尽我们作为中日文化研究者的绵薄之力。

此次由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蔡凤林博士经多年殚精竭虑而发起，汇集以

^① 据2011年8月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公众对日好感度为28.6%，下降10%；日本公众对华好感度为20.8%，下降6.5%。

中国民族院校日本学为主的中日民族文化比较研究界同仁创编《中日民族文化比较研究论丛》(以下简称《论丛》),可说就是应全球化的时代要求和中日文化关系发展的需要,基于“学术乃国之利器”之精神,为担当和履行“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学术使命而启动的。特别是该《论丛》发挥中国民族院校具有多民族文化教学和研究的特长,将“中日文化比较”和“中日民族比较”这两个原属“文化学”和“民族学”的分支统合在一起而作为其研究的范畴和视角,可称是当前中国日本学界和中日比较文化研究界的一个新的创举和杰作。我作为一名学习和研究日本语言文化、日本思想文化和中日比较文化四十余年的学者,由衷地为此感到高兴并深受鼓舞。欣喜之际,奉命就中日比较文化研究的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肤浅认识和思考,以为本《论丛》的创编及其事业的兴盛和发展“给力呐喊”、壮势助威。

二

我们知道,自19世纪人们开始从近代科学意义上研究文化,比较文化学就应世界各国之间的统一发展和联系的需要而兴起,成为文化学的一个分支。比较文化研究于20世纪初在中国和日本形成高潮,二战后以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对日本文化的研究为标志,又一次出现了高潮,到70年代进而发展为世界性的学术思潮。回顾中国20世纪以来的中外比较文化研究史可以看到,20世纪初在中国出现的比较文化研究高潮,是伴随着“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新文化运动而展开的,因而此阶段的比较文化研究多以中西文化的比较为对象,以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提倡西方的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为主要导向。当然,这期间亦有特别崇尚中国文化而力斥西方文化之非的言论,如学贯中西的大学者辜鸿铭称:“英国人博大而不精深,德国人精深而不博大,唯有中国既博大而又精深。”但辜氏认为继承了真正的中国文明之精华的是日本人而非中国人,甚至断言:“应该说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国人,是唐代的中国人。”^①这种观点正确与否暂且不论,但其将日本文化归为中国文明,或可视为日本文化为何未能成为当时中外比较文化

^① 参见《辜鸿铭文集——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岳麓书社1985年版,原文发表于1924年。

研究对象的原因之一。

在以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日本文化模式》为代表而出现的第二次比较文化研究高潮中，日本文化也由此成为世界比较文化研究中的醒目对象之一。但在中国的中外比较文化研究视阈中，日本文化仍未占据重要位置。例如文化研究大师朱谦之，虽著有《扶桑国考证》（1941）、《日本哲学史》、《日本的朱子学》、《日本古学及阳明学》、《新编朱舜水集》等大量有关日本思想文化的著作，但是在其为撰述《比较文化学》做准备的《比较文化论集》（1949）中，却没有编入一篇以日本文化为比较对象的论文。因为在朱谦之的视阈中，世界文化的体系，“仍然只有中（哲学型）、印（宗教型）、欧（科学型）三个文化单位”^①，日本文化既不属于宗教型，也不属于哲学型或科学型，故而未被纳入其比较文化研究的类型对象。

在20世纪70年代比较文化学发展为世界性的学术思潮后，日本文化才终于成为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的重点对象，但日本民族文化成为中国比较文化学界重点对象是由于在如下的要素使然的：第一，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而快速创造的经济奇迹以及学界“日本文化论”的高涨，使其民族文化地位陡然上升；第二，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使中日间的文化和学术交流空前高涨；第三，中国改革开放和致力于现代化的方针，使学界出现了旨在“借他山之石攻玉”的“日本研究热”。在这种背景下，80年代中日比较文化研究形成热潮，相继涌现出了大量富有真知灼见的著作和论文。仅就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和论集而言，主要关注了如下问题的比较和研究：（1）中日文化交流史和中日思想文化关系问题，如梁容若著《中日文化交流史论》（1985）、王晓秋著《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1992）、王家骅著《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1990）、严绍璁等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3·思想卷》（1997）、刘金才主编《报德思想与中国文化》（2003）等；（2）中日传统文化以及对西学的态度与两国近代化进程的关系，如王晓秋著《中日近代启示录》（1987）、崔世广著《近代启蒙思想与近代化——中日启蒙思想比较》（1989）、王家骅著《儒家文化与日本的近代化》（1995）、赵德宇著《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中日西学比较研究》（2001）等；（3）中日民族性和国民性特征之异同，如李甦平著《圣人与武士》（1992）、尚会鹏著《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

① 朱谦之：《比较文化论集·序》，引自2009年12月30日中国宗教学术网，<http://iwr.cass.cn/>。

化心理的比较研究》(1998)等;(4)关于中日文化的结构性定位问题,如盛邦和著《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2010)等。此外,诸如北京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中日比较文化论集》(1990)等各种中日学术研讨会论集,涉及问题更加广泛。例如中日道德观和伦理价值取向的异同、中日宗教及宗教信仰的异同、中日家族结构和家意识的异同;中日思维模式与价值观模式的异同、中日审美意识的异同、中日技艺观的异同、中日群体精神和“面子体系”的异同、中日的人际关系及交际方式的异同、中日政治文化的异同、中日风俗习惯的异同、中日商企文化的异同等,都成为中日比较文化研究的课题,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今后中日比较文化研究的深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然而,随着全球化浪潮下文化的“趋同化”与“文明冲突”加剧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在中日之间日趋严重,使我们不得重新思考和理清中日文化关系及彼此间的定位,不得不更加关注两国人对彼此的历史关系认知的差异问题,不得不深入探讨和研究消弭彼此间的文化冲突和寻求文化认同的途径。

关于中日文化关系,迄今我们常使用“同属汉字文化圈”、“同文同种”、“文化交流历史源远流长、水乳交融”等溢美之词来形容。但在给中日文化关系纵向定位时,往往采用所谓“正”(These)、“反”(Antithese)、“合”(Synthese)的“三阶段说”^①,即把中日古代文化关系称为“华夏文明恩泽东瀛、日本以中国为师”的阶段;将近代文化关系视为“日本近代文明反哺中国,中国以日本为师”的阶段;将现代文化关系称为“中日相互学习、共同发展”的阶段。这种宏观地从中日文化互动的主流趋向纵向定位中日文化关系的言说,虽然说是比较客观的,但其“恩泽”、“反哺”以及“正”、“反”等说法却隐含着“华夷观念”倾向。在从横向为中日文化关系定位时,我国学者则往往喜欢依据“东亚儒教文化圈论”,将中日文化定位为“内核”与“外缘”之关系,^②或者根据日本文化的生成源自中国文明的根植,将中日文化定位为“亲子关系”。这种定位从一定意义上讲应该说不无道理。与此相对,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对

① 季羡林:《中日比较文化论集·序》,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② 盛邦和著:《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日中文化关系则这样定义：“一般认为日本文化犹如树木的种子，是从开始就存在的，它靠中国文化的养分而培育了起来。而我则认为日中文化关系就如同做豆腐，日本文化如同豆浆，本身就具有成为豆腐的素质，而中国文化则是使之凝固成豆腐的卤水。”^①无论是一般论中的“树木之种与养分之关系”，还是内藤湖南所认为的“豆浆与卤水之关系”，无疑都是基于“日本文化之根是自己而非中国”的立场而言的，表现了日本人自我文化本位的意识。究竟如何定位中日文化关系？我认为亨廷顿的观点比较中肯，即认为日本文明“是中国文明的后代”，但“中国文明”和“日本文明”属于性质不同的两种文明。^②我之所以同意这种观点，是因为从文明类型上讲，古代中国属于原生型的典型大陆农耕文明，而日本文明虽受中国文明的哺育而形成的，但基本属于外源型的岛国稻作文明，这种原生型的典型大陆农耕文明与外源型的岛国稻作文明的差异，以及双方长期的“自然隔离”、“语言隔离”、“社会隔离”和“心理隔离”等“文化阻隔”，使中日这两个东亚的民族国家形成了不同的历史、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价值取向以及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情感取向。在日本容受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之所以引进了律令制度而又将其“格式化”^③，学习中国的封建制而不采用郡县制（明治维新前），引进了“大学寮”而不取“科举制”，仿学唐朝宫廷文化而不用“宦官制”，吸纳儒家思想而拒斥孟子的“易姓革命”说，崇尚古代中国礼俗而不学“缠足”，奉朱子学为官学（德川时代）而不学“八股文”，推崇儒家伦理却排斥“仁”而提倡“忠德至上”等，说明日本文化虽然是在容受中国文化的基础上而生成的，与中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乃至血脉联系，但在根本的文化机制上是不同质的。因而在中日比较文化研究中，不仅要重视对中日基于“文化交流”和“文化选择”而形成的文化关联性和同质性进行研究，而且要重视对中日基于“文化发生”和“文化隔离”而形成的文化类型的异质性和文化内涵的差异性进行研究。因为我们通常讲的“求同存

① [日] 内藤湖南：《日本文化是什么？》，《内藤湖南全集》第九卷，筑摩书房 1969 年版，第 3—4 页。

② 亨廷顿认为不能把“中国文明”和“日本文明”拼在一起，“而是承认日本文明是一个独特的文明，它是中国文明的后代”。参见 [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8 页。

③ “格”本是律令的部分修正和补充的法规，而“式”则是律令实施的细则。但自桓武天皇 797 年颁诏“视时施政，量事立规”，实行以设置令外官和制定新的“格”、“式”为代表的格式政治，使从唐朝引进的律令制名存实亡，成为日本庄园制形成的重要原因。

异”原则可以用于中日交往，但在学术研究上应该坚持“同就是同”、“异就是异”的实事求是原则。

四

进行中日民族文化比较研究，除了上述的文化关系之外，还需要关注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历史关系问题。纵观迄今的中日关系史，事实上并非像某些诗人所描述的“黄河之水通江户，珠穆朗玛连富士”，也并非如外交辞令所说的“两千年友好，五十年不幸”，而是一种“先师后徒”、“先徒后师”、“亦师亦徒”、“师生强弱胜败角色反复易位”、“恩怨情仇交织”的复杂关系。这种“师生强弱胜败角色反复易位”和“恩怨情仇交织”的关系史，对于中日跨文化认知和相互理解必然造成如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说的理解主体之间作为理解前提之一的“先有”^①——历史和文化传统之隔膜，因为中日基于各自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立场对这种关系史的认知取向、情感取向和价值判断取向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例如双方在对中日关系史实记忆、认知和体认方面：中国人记忆、体认的重点，多在于：（1）中国文明从衣食住到文物制度和思想文化给予日本的重大恩泽；（2）日本对中国长达50年的侵略战争和半殖民欺凌以及由此造成的割地赔款伤痛和被践踏的耻辱。日本人记忆、体认的重点，则多在于：（1）日本近代从语言文化到近代革命思想和经验对中国的输出和贡献（实际是伴随着殖民侵略）；（2）日本在两国邦交正常化后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的所谓“变相赔偿式”贷助以及诸多工业化经验和技術援助等。

再如在对中日古代关系的认知方面：在许多中国人的意识中，不仅认为中国是日本当然的老师，日本近代以前的文化都是从中国摄取的，而且基于“南蛮、北狄、西戎、东夷”的华夷观念和日本曾向中国古代王朝朝贡请封的历史，认为自己是“华”而日本是“夷”，中日古代是宗主国和朝贡国的关系；而在众多日本人的意识中，虽然承认在“华夷变态”^②以

① “先有”：（德文是 *vorhabe*；英译为 *forehaving*）是海德格尔在其《存在与时间》中提出的“前理解”的概念之一，意指每个人所属的特定历史与文化传统。

② 1672年林鹤峯的《华夷变态》已经开始强调，“应当把‘本朝’（日本）当作‘中国’，这是‘天地自然之势，神神相生，圣皇连绵’”，“使日本形成（自己）真正中华文化对蛮夷清国的观念”。

前是“以中国为师”的，但认为日本传统文化是以“绳魂弥才”^①、“和魂汉才”、“国风化”和“和魂洋才”等日本独特的方式创造而来的。

还例如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诸如“南京大屠杀”、“抚顺万人坑”、“七三一活人细菌实验惨案”以及日军在中国的烧杀抢掠奸辱等暴行，对于持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价值观的中国人而言，是很难从记忆中抹掉的。尽管毛泽东战后曾说“过去的战争应由垄断资本、军国主义政府负责，而不应由日本人民负责”^②，但在广大中国民众心中，无论如何也难以将日本政府和右翼与日本民众相分割，更难以将其“近代发展史与其侵略历史相分离”。与此相对，日本战后虽然也出现了批判日本军国主义文化和反省侵略战争的思潮，但作为加害者从心灵深处进行反省者并不占主流，因为日本“近代文明进程与对海外殖民掠夺同步，近代国家发展与对外侵略罪恶相伴”的近代发展史，使欠缺“对历史的敬畏心”、缺乏恒定性原则和无视“善恶区别”他律性耻辱观的日本人，很难走出其“历史认识”的误区。因而中日历史关系以及双方对于彼此关系史认知的差异问题也应纳入我们的研究范畴。

五

谋求和建构中日民族间的文化认同，应该是我们进行中日民族文化比较研究最主要的鹄的之一。然而我们知道，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作为文化学中的一种常见文化现象，其含义是指不同文化在交流中对不同文化的承认、认可、接受，它既包括在跨文化交流中基于平等立场的价值理解，也包括个人对自身所处文化的认同。但无论是对异文化的认同还是对自身所处文化的认同，都需要在认知、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方能实现。尤其是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认同，往往还需要如葛兆光教授所说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个向度的要素。^③即第一，承认我们彼此过去曾经有一个共同的或紧密相连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第二，承认我们现在与“其他人”（如欧美人、非洲人）是具有文化差异的一群人；第三，相

① “绳魂弥才”这一言说是梅原猛作为日本文化重层性的特点提出的，意为“绳纹的精髓、弥生的技能”。主要强调弥生农耕文明虽是大陆移民传入的，但其只是“技能”或“才觉”，日本文化的精髓完全在于本土原初的绳纹文化。

②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247页。

③ 参考葛兆光：《何为东亚？什么是文化？如何才认同？》，“全球化过程中东亚文化的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资料集。

信我们将来都要走一个共同的道路，并在这条道路上会同舟共济。

关于第一种要素，从前述的中日间的文化传统关系看毫无疑问是存在的，加之两国人均承认“属于同一汉字文化圈”，所以这第一种要素的基础可以说是具备的。但第二和第三种要素就很难说具备了。由于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脱亚入欧”和文化上的西方化，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有意识地“去中国化”等问题，所以第二种要素所要求的“我们现在与‘其他人’是不同的一群人”之意识是很薄弱的。可以预料，这两类要素必然会对文化认同所要求的第三种要素——“相信我们将来都要走一个共同的道路”产生重要影响。但真正的相互信任，却需要文化认同，因而消弭和缓解中日之间的“文化冲突”是建构“中日互信”和文化认同的关键。

然而要消弭或缓解中日之间的“文化冲突”，需要在认知对方时，按照“文化多元共生”理念所要求的“以异质性的他者文化的存在为前提”，尊重彼此文化的差异。中日之所以在经历了21世纪伊始长达七年的“冰河期”后将“尊重彼此文化差异”作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基础和保障写进了《联合声明》^①，就是因为双方已认识到“尊重和认知彼此文化的差异”，对于缓解中日“文化冲突”和建构文化认同的重要作用。这种做法，对于培育中日文化认同所需的第三种要素，无疑是重要的一环。

当然，在中日这样“师生强弱胜败角色反复易位”和“恩怨情仇交织”之关系的两者之间，要建构文化认同并非易事。因为已有不少学者指出，中日之间在17世纪中叶以降，“过去的文化认同和相互尊重已经成为历史”，就如同《华夷变态》所表明的那样，中国在日本人眼中已经成为“夷狄”，“文化价值已经逆转”。^②这虽然是基于历史事实而言的，但是无论是中国的“华夷观念”还是日本的“华夷变态说”，实际上都是基于“自文化中心主义”的产物，在全球化语境和多元文化时代的主体意识下要谋求中日间的文化认同，首先需要摒弃“华夷观念”和“华夷变态说”的思维定式，确立“多元文化共存”全球化之理念，在相互认知和理解中倡导坚持“主体间性”原则。尤其作为中日比较文化和中日关系的研究者，更需要坚持跨文化认知和理解的“主体间性”原则（不是主体对客体的理解，而是主体之间的理解），不将异文化视为“客体”，而是将其视为与自己平等的主体，不追求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而是以承认差异性为前

① 参见2009年10月10日《中日韩合作十周年联合声明》。

② 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载《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1期。

提。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出现斯宾诺莎所说的“偏见比无知离开真理更远”之类的误读，尽可能做到客观、理性地识解和认知彼此的文化传统，逐步走向文化认同。在《第七次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中，中日的知识分子对对方民族国家的好感度分别为43.1%和40.6%，远远高于两国一般民众的28.6%和20.8%。如果说中日双方的相互好感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个民族之间相互文化认同程度的话，那么两国知识分子与一般民众之间的这种相互好感度的悬殊差异，也正好验证了能否客观、理性地认知和识解彼此文化对于增进两国人跨文化理解和文化认同建构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这也是我们从事中日民族文化比较研究者的重要使命之一。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我们期待着《论丛》不断结出比较文化研究的硕果，并愿《论丛》同仁“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聚精于客观求真理，“不畏浮云遮望眼”，勇攀学术最高峰，为中日民族文化比较研究做出无愧于时代的应有贡献。

2012年重阳节

目 录

总 序/刘金才/1

引 论/蔡凤林/1

关于构筑中日民族文化比较研究学术领域的思考/蔡凤林/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崔世广/28

近三十年来日本学界对中国少数民族研究动态概述/崔 莲/45

倭人的起源——越/董楚平/74

小议江户汉诗中的茶与禅

——以中日诗歌中“茶烟”一词的语义差异为例/郭 颖/89

中日干阑式建筑的同源关系初探/黄才贵/97

日本人元求法禅僧与幻住派/纪华传/114

近十年中国日语语言学研究回顾与思考/刘艳文/126

水稻人工栽培的发明与稻米之路/梁庭望/141

渤海通聘在中日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卢 伟/146

汉日同形词对比研究/李 蕊/154

关于日语和维吾尔语的名词化研究/木田章义/161

平安朝公卿日记中的琵琶/裴晓宇/185

中国傩戏与日本能剧比较研究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潘贵民/203

中日古代妇女游风之比较

——以明清时期与江户时代为中心/汤 丽/211

浅谈日本稻作文化

——以新尝祭、大尝祭、神尝祭为中心/汪玉林/219

唐代渤海国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王 玲/224

中日端午习俗比较研究/王晓东/229

赴日宋商的海神信仰与祭海祈风习俗/薛 豹/239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民族文化调查/晓 春/256

中国傩文化在日本的流变/张爱萍/262

从接触语言学角度看外来词和混种词的不同特点

——以日、汉、朝鲜三种语言词语为例/张兴权/269

倭彝民俗文化比较研究/朱文旭/275

后 记/284